

朱子诗词中的政绩观

□丁文新

世人皆知朱子(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穷究天理、教化后世,其《春日》《观书有感》等哲理诗流传千古,却往往忽略,这位一生心系家国的儒者,也在仕途之上躬身践行仁政,将自己的为官之道、政绩追求,尽数藏于那些不事雕琢、情真意切的诗词之中。朱熹的政绩观,从来不是高居庙堂的空谈,也非追求虚名的功利,而是融民本为根、清廉为骨、勤政为要、务实为魂的为政初心,在字里行间,尽显儒者为官的担当与情怀。

壹

朱熹的政绩观,首重民本,以百姓饥寒温饱为政绩第一要义。在他眼中,为官者的使命,从来不是谋求官阶升迁、政绩显赫,而是恤民隐、解民忧,让百姓安居乐业。这种理念,在他的诗词中俯拾皆是。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青年才俊朱子刚23岁,便作《社日诸人集西冈》一诗,感怀“农亩怀岁功,壶将祝神灵”,展现了他与民同乐的真挚情感和他早期民本思想的萌芽。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闽北洪水肆虐,崇安一带死伤狼藉、田亩尽毁,朱熹虽无官职在身,却主动奔走赈灾,目睹民间惨状,他写下《杉木长润四首》,“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藉正悲吟”,字字泣血,满是对苍生苦难的悲悯;“伤哉半菽子,复此巨浸攻”,将百姓的疾苦刻在心头,毫无文人的疏离之感。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朱子时任南康军知军,面对严重的旱情他作《秋日告病斋居奉怀黄子厚刘平父及山间诸兄友》一诗,叹“况复逢时旱魃,农亩无馀收”,对无辜受难的百姓充满同情,并为此深感忧虑:“而我忝朝寄,政荒积愆尤”。作为地方长官,他将灾情与自己的

施政联系起来,认为自己有愧于朝廷的重托,因政务荒废、灾害发生而积累了许多过错,内心充满了愧疚与不安。朱子心中的政绩,从不是府库充盈、城池巍峨的表面繁华,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他与好友张栻(字敬夫)登临南岳衡山石廪峰,他寄情于《石廪峰次敬夫韵》诗:“家家有廩高如许,大好人间快活年”,不叹山水壮阔,反倒寄愿天下百姓都能仓廩充实、衣食无忧,这份以民为本的为政初心,跳出了传统官吏“重政绩轻民生”的桎梏,将百姓的冷暖温饱,当作衡量政绩的最高标准。

贰

朱熹的政绩观,坚守清廉,以公私分明为从政底线。他一生为官清廉,安贫乐道,从不以权谋私,更将清廉自持视为为官者的立身之本,这份操守,也在诗词中展露无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崇安、建阳、浦城等地发生大水灾,随后又遭遇大饥荒。粮食歉收导致粮价飞涨,饥民遍野,社会秩序动荡,甚至出现了饥民骚乱。面对官仓(常平仓)救济程序繁琐、反应迟缓、难以惠及偏远地区贫民的弊端,以及灾年高利贷者对农民的残酷盘剥,

朱子不仅设计了社仓的制度,更注重其廉洁运行。他题写《题米仓壁》一诗于仓壁,以“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警醒管理者必须公正无私、克己奉公。他告诫管理者,也警醒自己,权力是为民所用的工具,绝非谋取私利的资本,公私分明,才是为官者最基本的政绩底色。

朱子的清廉,从不流于口号,而是融入日常、身体力行。探访女儿时,面对粗茶淡饭,他非但不嫌弃,反倒赋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以淡然之态,道出安贫乐道的为官准则。在他看来,为官者不必追求锦衣玉食,能守清贫、存公心,心系那些食不果腹的百姓,远比贪图享乐、中饱私囊更有价值。这种“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的清廉操守,让他的政绩观褪去了功利色彩,多了几分儒者的清正风骨,也让后世明白,真正的政绩,从来离不开廉洁自律的根基。

叁

朱熹的政绩观,崇尚勤政,以恪尽职守、笃行不怠为执政态度。南宋官场,冗官庸政、

苟且度日之风盛行,不少官员得过且过、漠视民生,朱熹对此深恶痛绝,他主张“大抵守官且以廉勤爱民为先”,将勤政与廉洁、爱民并列,认为为官者唯有勤勉尽责,方能不负百姓所托。在《谨次大夫见属韵》一诗中,他写下“只愿从今更无倦,清诗美政逐年新”,既是对地方官吏的期许,也是自己的平生自况。他认为,为政之路从无停歇,唯有持之以恒、不辞辛劳,才能让善政惠及百姓,让政绩经得起时间与民心的检验。初任同安主簿时,朱熹便“莅职勤敏,纤悉必亲”,小到赋税簿书的核对,大到民间纠纷的调处,事事亲力亲为,唯恐吏人作弊、百姓蒙冤;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时,他深入基层,严查官吏瞒上欺下、弄虚作假的行径,整改仓储乱象,杜绝官场馈送陋习,即便政务繁杂,也从未有过懈怠。在他心中,勤政不是表面的忙碌,而是心系百姓的担当,是“苟利于民,虽劳无惮”的执着,这份勤勉,让他的政绩观落地生根,而非空中楼阁。

肆

朱熹的政绩观,秉持务实,拒绝虚浮,以实绩实绩为终极追求。作为理学家,他

始终强调“知行合一”,“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观书有感》其二),为政之道亦是如此,反对空谈义理、追求虚名,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利于百姓的实事、好事。他的诗词,少有歌功颂德的浮华之语,多是贴近民生、直面现实的真情流露,无论是写灾荒之苦,还是叹民生之艰,皆是对现实的真切映照,而这份务实,正是其政绩观的核心。他反对为官者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认为政绩从来不是写在文书上的数字,也不是口头上的空话,而是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倡行社仓法,是为了解决灾年百姓温饱的实际难题;整顿吏治,是为了肃清官场风气、保障百姓权益;减免赋税,是为了让民力休养、百姓安居。他一生为官仅九载,但始终以务实为要,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每一项政令都落到实处,让每一份政绩都惠及民生。正如他所言“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无论官职高低,唯有务实为公、为民办实事,才是真正值得称道的政绩。

时至今日,重读朱子诗词,体悟其中的政道情怀,依旧能感受到那份以民为本、清廉自守、勤勉务实的初心,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政绩,从来都刻在百姓心中,写在为民办实事的点滴之中。



朱子社仓(于崇高摄)

史海钩沉

四百年石像,“诉说”一段尘封往事

□张侯辰 文/摄



石像生

2 居敬行简的一生

游居敬少年时聪敏好学,23岁即中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之后他很快成为监察御史。在此期间,游居敬就以“严介执法,毫不容私”闻名,最引人瞩目的一次上疏,是弹劾当时声名极盛且身居高位的湛若水。《万历野获编》记载:“御史游居敬又论南太宰湛若水学术偏颇,志行邪伪,乞斥之,并毁所创书院。”游居敬在弹劾奏疏中,他痛陈当时士风:“慕虚名,而坏实行。背先训,而售空谈。原其始,将以猎誉。究其终,竟迷不返。”

在浙江任金事时,游居敬“核吏俗画民便利,禁湖游,戢戒坛,杭俗为一变”。其后在湖广任上,“贍宗祿,建议仓,賑饥民,立催征法以处积逋”,凡政务皆有条理。嘉靖朝倭寇常常入侵沿海,军费匮乏已经到了“库无赢羨”的地步,游居敬咄咄而办,迅速腾出财政盈余。面对外地前来围剿倭寇的客兵哗变,他又“前谕之,皆解散”,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兵乱。

游居敬在任副都御史、云南巡抚期间,还展现出良好的军事才能。当时云南东川一带,土司内乱久未平息。土司首领阿堂与安九鼎等势力“相攻十余年”,地方动荡不安。游居敬到任后,先是上疏请求会勘,又多次招抚阿堂,但对方始终不服。“居敬因屡招阿堂不服,乃出不意,督土汉兵进剿。”兵贵神速,这一行动迅速见效,“阿堂窘急,自刎死,三省遂定”。游居敬结束了云南长期战乱,“剪数十年之叛夷,人心痛快”。

但他“遽调土汉兵万余进剿”这种事急从权的做法,违反了既定程序。加上之前云南沐国公抢夺民田,游居敬秉公执法,二人不合。沐国公诬告游居敬受贿,打入诏狱,贬戍碣石。后隆庆皇帝即位,大赦天下,游居敬得以归乡。不久,因“在云南有功,负冤宜亟召用”,遂被重新起用为刑部侍郎。

1 烟草田边的石人石马

延平区南山镇有一处当地人称为“石人石马”的地方。这些“石人石马”,就是明代南京刑部右侍郎游居敬墓前神道的一部分。

若不是通过本地人的指认,来到1988年设立的文保碑前,很难想像村民耕种的烟草田边,安葬着一位在明朝的封疆大吏。神道最前方是一块石牌坊,额上阴刻“皇明钦赐祭葬”,神道碑上写着“明赐祭葬通议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可斋游公神道”。如今,神道已经修葺一新,中间铺上石板,两侧绿化,周围也加上了围栏,避免占用神道。不过,历经四百年风雨,石兽不知所踪,本来对立的文武石像

生,仅存文官石像生。好在石像生尽管有些边角已经模糊,衣纹还大体可辨。头戴冠帽,宽袍垂袂,神情肃穆而沉静。冠帽的侧面还能看出雕刻了簪子的细节。石像生双手拱于胸前,静静立于古柏之下,让人得以一窥明代士大夫的气象。

游居敬,字行简,号可斋,是游酢十六世后裔。作为游氏后裔,家中自然有着严整的家风。其父游纶为睢宁县令,为政以安民为本,捕蝗、浚河、减徭役,深得百姓拥戴。游纶从论语中择“居敬而行简”一句,为儿子取名字。“居敬行简”这一准则也深深影响了游居敬的一生。



神道全景

3 为四贤谏言

复出后的他,依旧保持直言本色。他三次上疏陈奏三件事,除了抨击宦官擅权,内阁作威作福以外,还请求皇帝将延平四贤之中尚未列入孔庙的罗从彦、李侗二人从祀孔庙。

游居敬在《请从祀疏》中写道:“今崇祀先师庙廷者,惟杨时、朱熹二儒,而罗、李二儒阙之,此岂所以报功德,而劝士习哉?”又将道统源流比作江河,捋清杨罗李朱四人的道统传递关系,主张四贤都要“崇祀庙廷,春秋从祀”。《请从祀疏》上奏以后,没有

回音。而抨击宦官和内阁的奏疏却引来内阁的报复,游居敬被迫辞官,不久病逝。

现在,通往游居敬墓的小路上,山悠悠闲地在烟草田边,吃着杂草。放羊人则坐在通往神道的台阶上,和乡亲闲聊。他们口中,游居敬“是个大官,游家的祖先”,除此以外,再没有了解。明代朝堂的沉浮,为延平四贤发声的事迹似乎都只留在史书中。好在神道周围重新修起围栏,还有清明后墓前尚未褪色的黄纸,都在说明还有后人记得。

一块匾额牵出百年情谊

□应积满 文/摄

5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宴致辞中,引用了一位中国清代官员的故事,借以说明中美两个文明交往的源远流长。而这位中国官员名叫徐继畲。

2016年,在延平区峡阳镇德胜街,由福建巡抚徐继畲等题赠的“拔贡”匾被发现。匾额白底黑字,正中是挺拔厚重的“拔贡”两个大字。上款题为:兵部侍郎福建省巡抚徐继畲、兵部尚书前闽浙总督刘韵珂、工部右侍郎福建学政彭蕴章为;下款是:己酉科选拔中式第一名应蔚华立,道光二十有九年小阳月吉旦。

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今山西忻州市人,晚清大臣、学者、近代地理学家。徐继畲在道光六年(1826)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被授编修之职。历任广西潯州知府、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延建邵道、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等职,并管理闽浙总督。有一段时间,徐继畲因通商事务久居厦门,多次与美国传教士雅理(David Abeel)晤谈,并向世界各地地形、收集整理各国政治制度,后将其内容编撰成《瀛寰志略》一书。

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写道:“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骏驳乎三代之遗意。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以华盛顿为首哉!”

1867年时,第十七任美国总统约翰逊感佩于徐继畲对华盛顿等的理解,专门将一幅华盛顿肖像画送给徐继畲。在中美隔着太平洋互相试探的年代,两位有识之士以一种近乎惺惺相惜的方式完成了精神上的第一次握手。

拔贡是明清时期科举体系中选拔府、州、县学优秀生员进入国子监的选拔制度,属于“五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拔贡”匾额的主人应蔚华也是峡阳历史文化名人。《西峡应氏宗谱·霞屏封翁传》载,应蔚华(1821—1886),字霞屏,讳蔚华,道光己酉科县学拔贡生,特授宜春州德化县儒学教谕,加中内閣中书衔(五品)。他因品学兼优,喜获三大官员褒奖,而为延平府科举一大盛事。

道光三十年(1850),应蔚华赴京,拜会前福建学政、工部右侍郎彭蕴章,禀陈峡阳修建屏山书院之事,彭蕴章欣然提笔写了《峡阳屏山书院记》,并载入《南平县志》。咸丰三年(1853),应蔚华投笔从戎,回籍办团练。咸丰九年(1859),被吏部选授为德化县教谕。晚年,应蔚华担任屏山书院掌教堂长,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

徐继畲作为朝廷大员,睁眼看世界,推崇民主与天下为公,其华盛顿纪念碑中文石碑投射着中华睿智的深邃目光。应蔚华身为地方小吏,心念桑梓家园,致力于书院教育,文化传承。其“拔贡”匾额上的斑驳纹路间跃动着闽北文脉的坚韧心跳。



匾额